

·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研究专栏 ·

【编者按】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该规划提出了青年发展的指导思想、根本遵循和总体目标,并制定了促进青年发展的一系列目标和措施。可以预期,关于青年发展的这一纲领性文件将对青年发展实践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值得引起高度重视。有鉴于此,本刊将不定期推出“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研究专栏”,重点刊发相关文章,以更好地促进中国青年发展的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青年发展实践。

共青团组织推动高校学生社团 发展与治理的历程研究*

李 丁

摘要: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实践和探索过程。强国家如何认识和调整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合作增权还是对立冲突,对社会组织的长远发展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影响巨大。本研究通过还原共青团组织积极推动高校学生社团发展和治理模式定型的历史过程,展现了群团组织在社会建设和推动社会组织治理转型中的作用。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立起合理的制度框架,保证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和自主性,才能同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国家管理的合法性。高校学生社团发展和治理过程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共治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高校 共青团学生社团 社会组织 社会治理

2000年以来,高校学生社团迅速发展。共青团组织在其中不仅起到了推动作用,还促进了以社团联合会为依托的学生社团管理模式的形成。这种治理经验为此后“枢纽型”社会组织概念的提出以及依托群团组织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开展社会建设的实践提供了启发(田凯,2016;罗贵榕,2006;冯志明,2011;郑长忠,2012a;刘海春,2013;王鹏,2013;徐双敏、张景平,2014;李威利、郑长忠,2015)。这种治理模式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上下合作探索的结果。学生社团尽管能够丰富大学生活、构建校园文化,但在历史上,大学生和学生组织总是和社会运动、革命关联在一起,在政治上是高度敏感的。共青团组织如何认定学生社团值得信任?在积极推动学生组织发展的同时又如何保证它们的政治忠诚和组织纪律?新的治理模式是否受到挑战?高校学生社团的发展与治理历程充分反映了宏观政治环境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以及基层组织的能动性,为找寻民间社会组织治理路径提供了经验。

一、文献综述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生的结构性力量,被认为可以提高社会组织化水平、增进社会资本、扩大公共服务供给、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但其自主性的增长和民主化倾向又可能约束国家权力、挑战政治稳定(康晓光、韩恒,2005)。因此,在国家和社会组织关系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合作增权论认为,社会组织与国家、市场之间能够互补合作,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增进人类

* 本研究获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决策咨询及预研委托项目支持(12XNQ071)。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唐颖、唐承祚的建议和帮助,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对本文也有很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福祉的稳健性,因此,应该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冯钢,2012;纪莺莺,2017;顾昕等,2006);而冲突对立论认为,社会组织保护社会免受国家随意干预的本性会对国家造成限制,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反映的就是其理想类型,但国家过度受缚会导致其效率低下,从而影响国际竞争力,甚至引发政权不稳,因此应该抑制或谨慎发展(何增科,2006)。

近年来,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有所改善,国家对待社会组织的态度从全面管制转向分类控制(康晓光、韩恒,2008),进而分类发展的格局(敬义嘉,2016;田凯,2016)。但在此过程中,国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行动者,不同部门对待社会组织的态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公共服务部门更看重社会组织的服务和治理功能,持鼓励发展态度,甚至出现倡导社会建设的“政策范式”(李友梅等,2012;王名,2009;黄晓春,2017)。而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权维稳工作的部门则更在意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组织能力,主要持控制或谨慎发展的态度,在对何种组织可以发展、何种组织需要控制上更为审慎。面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党和国家一方面试图建立制度、设立监管部门对社会组织的注册成立、经费和人员安排、重大决策、日常活动等各个方面进行管理,甚至尝试在社会组织内部设立党组织,以保证社会组织的可控性和忠诚度。另一方面,进行群团组织改革,消除群团组织“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和最根本的“脱离群众”的弊病,以更好地联系和服务群众、新社会力量及社会组织。总之,通过各种手段凝聚社会共识和力量,为党实现核心目标服务。

部门之间的态度差异导致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核心制度难以及时调整。社会组织自由发展仍面临诸多限制(俞可平,2006;顾昕、王旭,2007),经常被灵活治理,较难形成长远预期,成为真正的服务主体和治理主体的路还很长(黄晓春,2017;黄晓春、嵇欣,2014)。如何创新政治架构,统合各种新生社会力量,既保证它们的自主性,又保证其忠诚度,既改进社会治理模式、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又能稳固党的执政地位,是执政者面临的重要实践(关信平,2011)。学生组织可以丰富校园生活,增加学生的政治效能感,但又被认为一旦控制不好,就会成为学生运动甚至社会运动的组织基础。如何平衡学生组织的发展与高校稳定备受维稳部门关注。高校环境尽管与外界社会有所不同,但在社会自组织发展上面临着类似的结构矛盾,通过分析高校学生社团发展和治理制度的形成历程能为我们提供启发。

既有针对高校学生社团的海外研究大多可纳入“威权韧性”研究(张长东,2014)。在这些研究中,学生社团被用来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生在政治上的沉默(Dickson,2013),被认为是官方组织管控体系的重要部分,意识形态教育的平台。这些研究认为,第一,很多学生社团是在官方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在目标和活动内容上是亲体制的。第二,学生社团的骨干很难超越校园的权力资源结构,独立自主性差,只是新传统主义庇护关系网络中的积极分子。在追求奖励和个人发展机会(入党和保研)的过程中维护了稳定。第三,高校通过灵活的社团管理和活动审批,使得能够成立的社团组织和得以举办的活动都是非对抗性的。第四,尽管意识形态教育在认同层面上不太成功,例如高校政治课吸引力很低,年轻人主要出于职业发展等功利主义目的申请入党,意识形态上的忠诚度并不比非党员高(Guo,2005;Dickson,2013),但通过强制性的必修课堂以及在各类活动中添加政治符号和意识形态话语,国家向大学生展示了自身无处不在的强大性,从而带来归顺和臣服(Huang,2015)。总之,这些海外研究认为,高校通过意识形态教育、思想监控与管制、敏感期重点防护等多种手段来维持校园稳定,学生社团及其灵活的治理体系也是其中之一(Yan,2014)。在这些研究看来,中国高校是一个充满监控、威慑、收买的控制系统,学生是被控制的对象,而这种治理模式是强大的威权体制一手缔造的。这些研究忽略了高校学生社团发展和治理模式演化历史过程的曲折性和多种可能性,没有看到大多数学生社团成立和运作中的自主性,以及隐藏在高校学生治理模式背后的自由空间,更少注意到社会合法性和组织环境对国家管控的平衡与制约。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由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工作展开。他们的政治立场与国外研究者完全不同,但与国外研究者一样,特别强调高校学生工作(包括社团治理)对维持国家稳定的政治意义(刘宇昊,2012;刘秀丽、陶伟华,2013;孙蚌珠,2002;张宏,2004;朱小根,2005;王运东、刘桂宇,

2013; 顾海良 2004)。在肯定学生社团在丰富校园生活、满足学生日益提高的社会文化需求方面的作用的同时,即便看到学生社团发展有限、自主性不足,也倾向于以潜在威胁为由,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对学生组织的管理和引导(张丽媛 2011; 张仁伟、葛卫华 2008; 李志清 2012; 白鑫刚 2008; 胡继冬、高中建 2011; 麻富游 2008)。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高校学生社团发展情况与治理现状提供了大量分散的素材,但它们的政治预设过强,应然陈述太多,未能与社会组织领域的学术研究形成良性对话,科学性和学术性都有待提升。

总之,国内外研究大多落入了社会组织与国家对抗或零和博弈的偏见,结论受前置政治倾向影响,对当前高校学生治理模式的形成与演变过程缺乏深入认识。本研究认为,针对高校学生组织和学生治理的研究应该从海外威权主义模式和国内强调管控的倾向中超脱出来,深入高校学生社团发展的组织处境与历史脉络,透彻理解不同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矛盾态度的依据,直面党的领导和对社会组织的政治信任问题。近年来,社会组织研究更多从国家视角和社会治理视角考察社会组织的发展实践(纪莺莺 2016a, 2016b),将国家与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关系问题悬置,较少做抽象理论上的讨论,法团主义、公民社会或多元主义等框架被逐渐弃置(纪莺莺 2013)。大家似乎都等着社会实践带着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模式发生自然转变。未来如何破局,实际上仍有待国家在实践中明确社会组织的自主空间与治理模式,完善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和服务主体的框架性制度(黄晓春 2017),给予社会组织以“政治信任”。本研究将努力还原高校学生社团的发展历程,分析共青团组织推动学生社团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风险把控技巧,评估突发颜色革命对高校学生治理和社团发展的影响。从而呈现高校学生社团发展突破政治困境的方式,透视政治因素及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治理格局的影响。

二、高校学生社团的兴起

改革开放后,城市社会管理逐渐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高校更多地保留了“单位制”或军事组织特征。学生集中居住在校内,归属一定的院系、学科、班级单位,形成了“学科班级制”(张羽等 2011),自发成立的民间社团很少。在省直工委或高校教工委等上级党委领导下,高校党委领导的校内职能部门、各院系党团组织、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学生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学校学生工作处和团委给予业务指导,学院管理者、辅导员、班主任、学生干部、宿舍管理员等专兼职人员是具体执行人,其他院系在思想政治教育等公选课上给予支持(见图 1)。

在学生对官方意识形态和管理模式认同度高的情况下,这套政治-科层系统的管理效率很高。例如清华大学通过“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调动高年级积极分子为低年级本科生提供学习和生活指导,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且没有形成太大的财务与人员编制负担,成为高校学生治理的典型(林泰、彭庆红 2003)。但在官方意识形态合法性下降,政治忠诚回报率低的情况下,治理效率会快速下降。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就出现学生工作队伍士气低落,人员变动频繁,难以对高校学生的不满进行平抑和疏导的情况。90 年代后,高校强化了班级管理、党团建设,重新重视日常政治表现及其与个人档案、毕业分配的联系(彭定国 1991)。上述科层系统的治理功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很快,市场化浪潮使得这套系统的效率又开始下降,大学生对出国留学、下海挣钱兴趣极大,政治身份、体制内单位对学生的吸引力下降,档案制度的约束力明显下降,学分制和选课制度改革进一步使得“学科班级制”下的班集体的凝聚力快速下降(夏敏 2012)。校园中功利化、市场化氛围日渐浓厚(向顺涛 1992; 何邦键 1994),大学生原子化的情况日益严重。与此同时,兴趣小组和学生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的名义下逐步兴起。

进入 21 世纪后,伴随着高校扩招和互联网在高校的普及,大学更是涌现了大量自发组织的学生社团,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甚至服务社会。例如,北京大学 2000 年之后社团快速增加(见图 2)。到 2004 年,北京大学在学生社团联合会登记注册的学生社团超过 115 家,分为政治理论、学术科创、实践促进、公益志愿、地域文化、合作交流、文化艺术、体育健身等八大类,参与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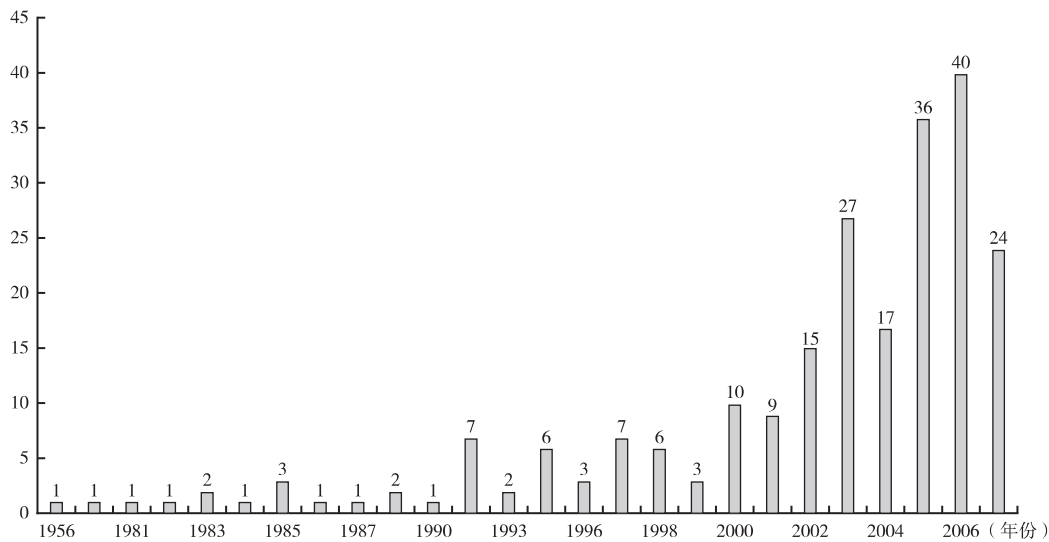


图2 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成立时间分布(1956-2007)

组织的各类活动。^①而2006年,浙江省高校平均社团数超过30,社团会员覆盖率达到在校生的80%(王珩2007)。全国学生社团的数量尚无权威统计,但有研究显示,2006年就超过45000个,社团数量过百的高校比比皆是(胡继冬2012)。相关研究显示,这些学生社团取向多元,类型丰富;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日趋灵活;与社会联系增多,资金来源复杂;组织形式网络化、虚拟化和扁平化;社团内部及跨校、跨国社团交流日益频繁;社团内外管理日趋规范,社团民主发展较快(石国亮2009)。随着学生社团的增长和社团活动的增加,相关研究也大量爆发(李浩泉2014),中国知网上以“学生社团”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快速增长(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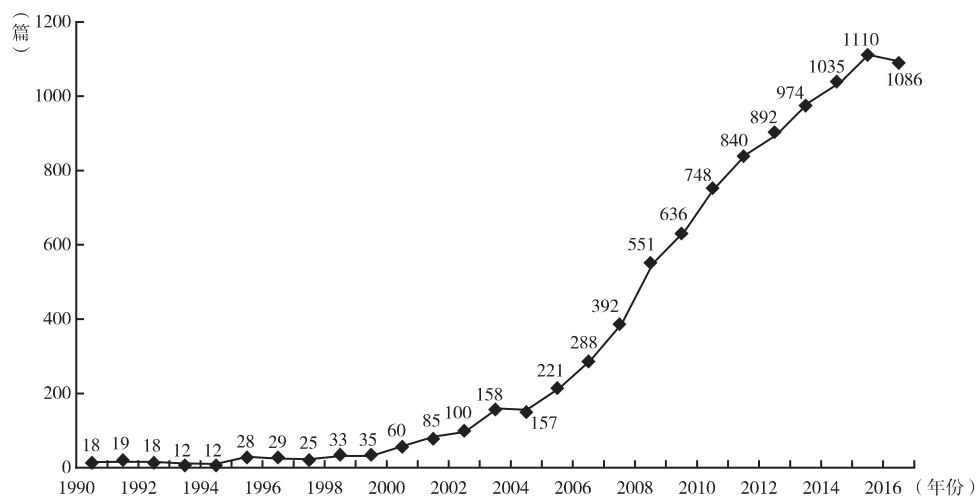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知网期刊论文库中主题涉及“学生社团”的论文数

与一般社会组织的发展受环境影响很大一样,高校学生社团的蓬勃发展与大学生群体及高校校园环境的特征有关。首先,随着市场化尤其是就业市场化的推进,大学生很快认识到,毕业出路

^① 徐敏 2009,《高校学生社团吸引近半大学生就业类社团突增》,《解放日报》5月19日(<http://www.chinanews.com/edu/edu-tlxy/news/2009/05-19/1698585.shtml>)。

和人生发展与个人综合能力和社会资本密切相关。无论预期毕业后出国、下海,还是进入体制工作,普遍希望在课堂学习之外丰富大学生活,提高综合素质,培养组织管理能力。专业教师、官方党团组织、班集体等都难以满足学生日益多元甚至有些前卫的需求,学生自组织社团为此提供了一种灵活的、自主性很强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方式。其次,学生的同质性和校园社会资本为社团合作提供了基础。他们年龄相仿,能力相当,所处人生阶段相同,有着较为一致的利益诉求、预期和认同;高校稳定的校园环境,共同的学习生活经历增进了彼此间的交流和信任,便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合作的达成;各个学校也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活动和制度培养学生的集体认同和归属感,促进学生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再次,大学生基础素质好,学习能力强,时间充足且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为社团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人员及时间保证。良好的基础素质与快速学习能力使他们能迅速掌握社团活动组织技能和社团管理,能够适应高校学生社团成员快速更迭的节奏,这是其他人群难以比拟的。最后,高校有着相对丰富的公共空间和设备资源,为学生社团活动的展开提供了硬件基础。除了这些因素之外,高校团委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三、共青团组织介入学生社团治理的动机与结果

由于针对此前一段时间的市场经济发展造成的新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局面以及1999年的突发事件,中共中央已从总纲上要求在坚持基本路线和方针原则、强化领导与投入的同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和方法,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尝试,不断创造新经验,切实解决思想政治工作覆盖到位、增强针对性等问题,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①面对学生社团的发展,高校并未采取封堵政策,而是从校园文化建设、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角度积极推动和大力发展。一些高校的社团自发联合形成了社团协会,更多高校在团委内部设立社团管理部门或指导成立了社团联合会,负责社团的登记、注册工作,在活动场地租借、活动申报、资金管理、对公交流方面给学生社团以引导和支持,^②鼓励学生社团跨校交流、联合。2004年12月9日,北京市63所高校的205个学生社团的代表在北京理工大学开会,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社团联合会。为了准备这个会议,共青团北京市委大学部针对首都高校的社团发展及管理情况进行了大规模摸底调查。调查认为,学生社团在思想政治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素质教育、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方面作用重大。在社团管理模式方面,“北京高校中由学校团委社团部门直接管理学生社团的有29所,约占北京高校总数的46.78%;由学生社团联合组织管理学生社团的有22所,约占总数的35.48%;由学生会管理学生社团的院校有4所,约占总数的6.45%。”调查报告认为,“各高校团委社团管理部门、学生社团联合会或协会都相继建立,完善了本校的社团管理工作机制,对学生社团的成立审批、组织建设、活动开展、财务管理、对外宣传、交流培训等方面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定期进行社团活动检查和财务监督,加强社团的管理和指导,社团建设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③无论是从共青团官方文件对学生社团的评价,还是从各高校的社团管理实践都可以看出,高校共青团对高校学生社团的发展和管理的积极性。

中国共青团之所以积极参与学生社团管理,不仅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1999,《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9月29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71382/71481/4854367.html>)。

^② 清华网络学堂,2017,《清华大学学生社团协会管理条例(2004年)》,9月2日(<http://learn.tsinghua.edu.cn/flfg/xs/txt/25-shetuan.htm>);北京大学学生课外活动指导中心,《北京大学学生社团管理制度汇编》,9月2日(<https://bbs.pku.edu.cn/attach/30/38/3038f408fd05078c/%E7%A4%BE%E5%9B%A2%E7%AE%A1%E7%90%86%E5%88%B6%E5%BA%A6%E6%B1%87%E7%BC%96.pdf>)。

^③ 共青团北京市委,2004,《北京高校学生社团的现状与发展报告》,11月3日(<http://www.bjyouth.gov.cn/special/200605whj/stfz01.shtml>)。

的若干意见》要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担负起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有关,也与其结构性位置及政绩冲动有很大关系。无论在校内校外,共青团系统都不是核心的管理服务部门。但其特殊的政治位置提供了其与青年人接触的机会,并实际占据了组织校园文化活动的机会;其贯通上级共青团、学联、青联的政治通道以及广泛的同级交往为部分积极分子提供了快速晋升的渠道和关系网络,^①这是高校其他职能部门所不具备的。一段时期内,团系统相对较快的晋升速度激励着团干部积极工作,试图在边缘岗位上做出制度创新和耀眼业绩,实现晋升或跳转实权部门。学生社团的发展就为高校共青团施展自己提供了机会。他们通过强调学生社团对思想政治教育、校园文化建设、学生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为学生社团发展争取资源和空间。

上级共青团组织也认识到高校学生社团发展的积极意义,并参与到学生社团的发展与治理中。例如,北京团市委不仅充分调查,形成了《北京高校学生社团的现状与发展报告》,还积极推动成立跨校的社团联合会,整合各校社团资源,推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及青年工作发展,彰显共青团系统的业绩。北京高等学校学生社团联合会成立后,分别于2005年、2006年组织了首都社团文化季活动,为高校学生社团跨校合作提供平台,为此还搭建了专题网站。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于2004年推出全国高校“优秀学生社团”及标兵评选,以“支持学生社团活动,促进学生社团发展,加强学生社团管理,引导学生社团健康发展”。首都高校学生社团发展和管理实践经验为全国高校社团发展和管理提供了参考。这集中体现在2005年1月团中央联合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团工作的意见》(中青联发[2005]5号,下文简称“《意见》”)中。《意见》从政治上肯定了高校社团发展的意义,认为高校社团是“新形势下有效凝聚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织动员方式,是以班级年级为主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补充”,高校应从战略高度加强和改进学生社团工作,“积极支持学生社团活动,大力促进学生社团发展;切实加强对学生社团管理,引导学生社团健康发展。”^②这为各地高校推动社团发展提供了依据。而且《意见》考虑到社团管理机构和制度的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问题,建议社团较多的高校成立社团联合会对社团进行管理(陈莉,2013)。这实际上给予高校学生社团以政治信任,同时奠定了高校社团治理的良性框架,有利于学生结社自由的持续与发展。

经过共青团组织的推动,高校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社团管理制度和分级分类管理体系。第一,社团大会或社团联合会构建了社团管理的合法性基础。全国很多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等都在2004年建立或改革了学生社团联合会,出台了详细的社团管理办法。社团代表大会或社团联合会成为社团表达利益与需求的重要渠道(陈莉,2013)。第二,高校通过组织全校甚至跨校大型活动(如社团招新、社团文化节、暑期社会实践等)为学生社团提供活动平台,将学生社团置于公开的市场竞争当中。各个社团都需要凭借自己的理念、组织方式和活动来吸引同学们的关注、支持与参与。“市场需求”成为引导社团发展的关键力量。北京大学每学期的社团招新活动周被同学们称为“百团大战”,届时“三角地”成为各个社团展示自己、争取低年级学生的“大市场”。第三,通过年检制度、优秀社团评比(如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大学中专工作部、北京高等学校学生社团联合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千团大战”)、社团发展支持计划等从制度上引导社团发展。使社团不仅在民间口碑上有所差异,在官方地位、资源、机会、声誉等方面也出现层次化。各个社团为了扩大在学生中的吸引力,更好地发展,也越来越注意相关的分化。第四,通过活动申请-审批制对社团正式活动进行精细监管。社团管理部门会综合考虑活动的风险、政治敏感性等评估活动在校园举办的合适性进行签批,并协同教务部和保卫部等统一管理

^① 高校共青团的特殊性可以从高校团员代表大会嘉宾来源看出来。不仅有多个上级团委负责人出席,还有众多兄弟院校的团委负责人代表出席或贺电。参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相关会议的新闻报道。

^②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2007,《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团工作的意见》(中青联发[2005]5号),3月21日(http://www.ccyll.org.cn/documents/zqlf/200703/t20070321_14553.htm)。

学校的教室和设备的租借使用以及广告横幅的布置。没有得到管理部门签批的活动只能私下占用闲置教室进行,难以进行公开宣传和动员,影响范围受限。

经此发展,高校学生社团成为校园社会文化活动生产的主体,课外互动的重要平台(郑长忠,2012)。高校学生治理由整齐划一的学科班级制向更为灵活化、扁平的社团体系转变。学生们自主组织社团、决定社团负责人、联络资源、进行组织建设和活动开发。各种社团充分调动了学生课后活动的积极性,吸引大量体力、智力和社会资源的投入,生产的活动和服务与学校管理部门、团委和学生会等官方组织生产的校级活动形成了补充。极大地丰富了大学校园文化生活的供给,培育和提高了校园社会资本,增强了学生的自我服务、自我学习能力与对母校的认同。高校原有学生治理体系中的班集体和班团干部的重要性则大大下降了,除上传下达行政信息、组织少量集体活动外,班集体生产课外活动或构建共同体的负担大大减低。很多班级集体活动缺乏,班主任作用有限。班干部也普遍反映,同学对集体活动不关心,班级集体活动组织困难。

除了学生治理模式转型外,学生社团发展也为高校团委的转型提供了机会。高校共青团原来主要指导学生会和研究生会,而这两个组织吸引的学生和资源日渐有限。现在,高校团委可以通过社团联合会管理几百个小社团组织开展活动,覆盖大多数学生。而且不论是对学生的吸引力,还是开展的活动的数量与质量,社团联合会都开始超过学生会和研究生会(陈莉,2013),极大改变了基层共青团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正是借助社团联合会和多种多样的学生社团,高校共青团才成为培育和联系学生组织的“枢纽型”组织(冯志明,2011;郑长忠,2012a;刘海春,2013;王鹏,2013)。例如在北京大学,学生社团发展及社团活动是团委工作业绩的重要部分,^①学生社团和课外活动成为北大团委工作围绕的中心(见图4),各个部门都与学生社团紧密相连。北京大学团委通过整合社团活动、学生暑期实践、社会公益、创业创新形成了“第二课堂”概念,从学校争取到了稳定的资金和资源,明确了在校园的职能和定位——学生课外活动指导,实现了转型。而学生会、研究生会等传统学生组织的存在感大大降低,除了垄断性的政治符号功能,其他各种功能都面临其他社团的竞争和瓜分(陈莉,2013)。

共青团组织介入学生社团发展的经验甚至激发了更大的政治空间和社会治理理想,为“枢纽型社会组织”概念的阐释和推广提供了实践案例(郑长忠,2010,2012a,2012b,2013)。有研究认为,通过联系和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共青团等群团组织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可以进一步夯实自身政治地位,获得党的政治信任和支持,成为党主导的多元合作(或协商政治)中的重要一元(郑长忠,2010,2012a)。而在高校学生治理中,高校社团代表大会(或社会联合会)可以成为和团员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类似的常规性政治设施,为学生利益表达提供新的渠道和空间。在新时期群团工作和大统战思路的指导下,地方团委和各种群团组织在工作和征集意见时都开始考虑民间社会组织的意见,^②如在团代会中给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留有代表名额。

但实践中要进一步理顺不同组织及机构之间的关系、在政治上有更大的突破还有不少困难。通过新设立社团代表大会、社团联合会对社团管理制度进行合法化,高校团委实际上避免了直接接触既有组织制度和资源,采用的是一种增量改革方式(黄晓春,2017)。无须对既有团员代表大会或学生代表大会等制度进行改造,也没有让新生社会组织游离在官方掌控之外,或者往政治民主的方向上进行尝试。而是在职权范围内灵活调整了自身内部组织架构,方便与社团联合会及学生社团进行连接沟通。要想推进传统政治设施的进一步改革,有更大的作为,如将学生社团的指导老师明确为教师代表而非学校辅导员之类的改革,“共青团需要向党寻求的就不仅仅是工作性和利益性政

^① 北京大学团委,2008,《【团聚英才,青春共进】系列之二:提高综合素质,繁荣校园文化》,12月4日(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08-12/04/content_134248.htm)。

^② 2012年8月3日共青团北京市委召集第12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专门邀请了青少年社团负责人。参见中国共青团网,2012,《团市委召开团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8月7日(http://www.ccytl.org.cn/place/news/beijing/201208/t20120807_585206.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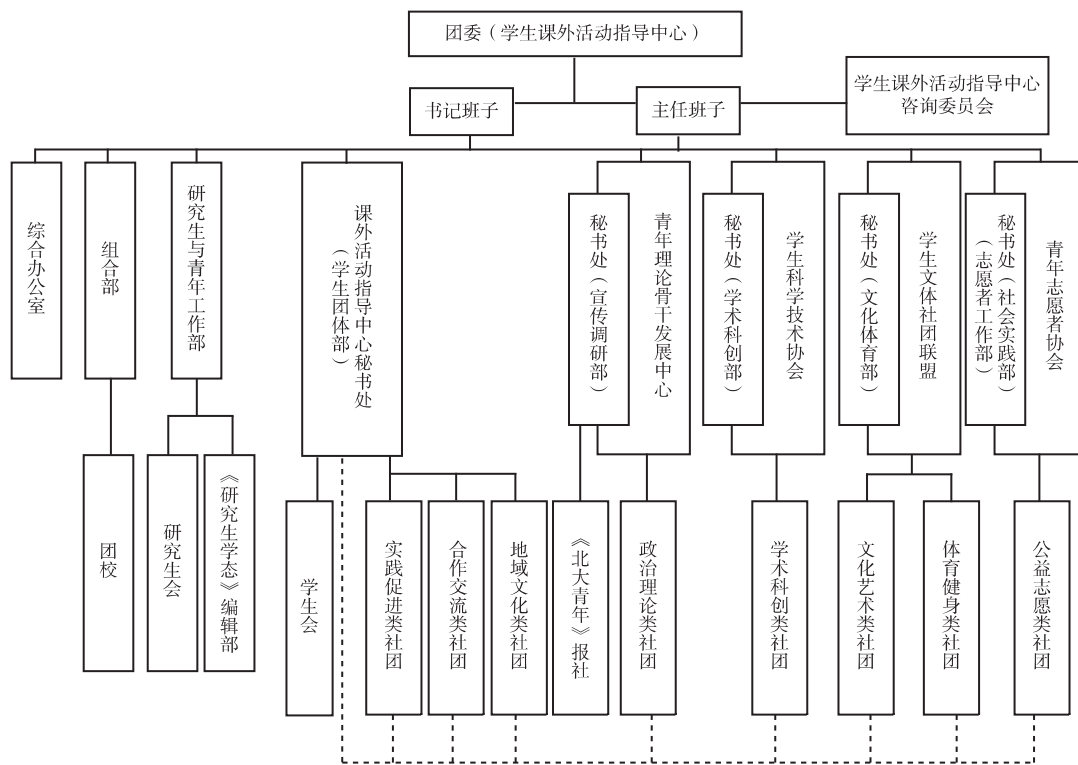


图4 北京大学团委组织架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团委。

策了 而应该是在此基础上寻求政党在政治上予以支持的保护性和激励性政策”（郑长忠 2010）。显然 得到这种政治信任和机会仍需契机。

四、共青团组织对学生社团发展风险的把控

共青团组织推动高校学生社团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风险 这包括学生结社带来的结构性政治风险 以及学生社团活动对教学秩序的负面影响和可能引发的突发事件两个方面。对党和高校而言，社团发展并不是目的 学生社团活动可以给高校人才培养和管理“锦上添花”，但若危及高校稳定，教学秩序和学生安危 就“得不偿失”。因此 高校校团委及相关部门都特别注意相关风险的把控。

两种风险中 社团发展带来的具体负面影响和突发风险是基层管理者主要担心的。学生社团发展早期过度商业化引发的负面评价就曾影响学生社团的发展。学生社团早期发展的商业化浪潮与大学生经济条件的改善、商业资本对大学生群体的重视有关；也与大学生资源动员能力增强从校内提供的社团活动资源有限相关。为了扩大影响 生产更高质量的活动 学生社团纷纷向校外商业机构争取赞助 并承诺广告效应之类的商业回报（李朝晖等 2014） 甚至90年代就有学生组织直接从事“社会服务”。一开始 学校监管较少 社团商业化很明显 最后引起校内有关部门、特别是教学科研部门和部分学生的反感。^① 这给校团委等负责学生活动管理工作的部门带来了压力。各高校逐渐严格控制学生社团在校内展开商业活动和商业宣传 要求社团在接受校外赞助进行活动宣传

^① 东方网 2004,《上海高校学生社团悄悄滑行在商业化的边缘》8月7日(<http://edu.qq.com/a/20040807/000019.htm>); 赵飞 2008,《一些高校社团活动“变了味”“商业化”令学生不堪重负》,《楚天金报》3月19日(<http://news.cnhubei.com/ctjb/ctjbsgk/ctjb21/200803/t258774.shtml>)。

时征得社团管理部门的同意。这暂时影响了学生社团的发展,但随着管理的正规化,加上学生家庭经济条件的普遍改善,校内支持的增加,这种影响很快就消除了。基层管理者更担心社团活动引发突发事件(如学生伤亡与群体性事件),但通过细心周到的准备,通常能够避免。为了预防类似的事件,社团管理部门会对可能存在敏感因素和风险的活动(如大型活动)进行严格审批,并强调责任落实到人,显得极为慎重。

学生结社的政治风险尽管为高校共青团组织担心,但这也提高了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基于国家对学生结社的政治担心,高校共青团组织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时,会特别强调社团工作的政治意义以及学生组织无序发展的潜在危害(李朝晖等,2014;潘秀山等,2012;王蕾等,2012)。在开展学生活动时,会特别在意活动的政治包装,以突显学生社团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正向作用以及共青团组织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创新性。在首都高校社团联合会成立大会上,领导发言首先提到2004年4月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并强调应该将联合会的成立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联系起来。

实际上,高校学生干部很清楚,尽管近代历史上学生社团常和社会思潮以及突发社会政治事件关联在一起(李浩泉,2014),但1990年后,高校学生社团组织的政治化有限,主要起到丰富校园文化、学生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的作用。首先,除了宗教信仰和流行文化外,这一时期并没有被大学生大范围追随的政治思潮。而在校内传教是被法律明确禁止的,与政治思想相关的学生组织恰恰是高校党委、团委推动成立的政治理论学习、宣传社团。学生自发的政治讨论以及与80年代一样围绕明星知识分子进行的思想传播很少见。其次,这一时期也缺乏需要学生组织作为参与主体的政治参与机会。大学生的政治参与仅限于相对正式的院系及学校的学生会、团代会选举,行政区内党员代表、人大代表选举,以及偶发的维权实践和民族主义游行示威活动。2004年前后,大学校园选举中确曾出现过独立候选人公开竞选的案例,但之后,这种政治机会迅速收窄。也有高校曾出现过为争取权益而进行的罢餐、罢课或网络行动,但大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与学生社团关联不大;而且随着高校维稳敏感性的提高,官方对学生诉求的回应更加积极,事件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最后,互联网是这一时期更重要的治理对象。高效、便捷、匿名性更强的互联网为大学生提供了新的巨大的言论自由空间。互联网(2010年以前主要是校园BBS,后逐步更替为社会性更强的人人网、微博、微信)逐渐取代线下集会、校园杂志、电话、短信,成为学生交往交流、表达异见、进行动员的首选渠道。高校学生管理部门在互联网舆情监管上投注的精力比对学生社团的监管更多。总之,这一时期,学生组织的建设性远远超过破坏性,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并不明显。况且,随着就业竞争的激烈化和学生对校园表现的重视,学生的行为也变得更为可控。此外,一线辅导员学习和借鉴了国内外高校学生社团的发展和管理的先进经验,使高校学生治理能力得到了提高,北京大学等先行高校在社团注册管理、社团活动管理上的探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这些为团中央联合教育部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团工作的意见》(中青联发[2005]5号),从政治上肯定高校社团的积极功能,给予高校学生社团以政治信任奠定了基础。

五、“颜色革命”对高校学生治理的影响

上述治理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种新社会制度和治理模式建立后,要持续发展,还需经受住突发事件和环境结构性变化的考验。国际社会突然爆发的一连串“颜色革命”迅速加剧了中央对大学生群体稳定性的担忧,高校开始强化学生治理和思想政治工作,迅速改变了此前高校学生社团发展和学生治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只是相关变化仍然没有颠覆国家对高校学生社团的政治信任和治理框架。

为对十六大精神进行宣传和贯彻,处理好“非典”事件并总结教训,中央制定了新的思政政治工作计划。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

班主任队伍建设等等。开始时,各级政府和学校贯彻并不得力,直到“颜色革命”发生且国家意识到其政治威胁。2004年格鲁吉亚、乌克兰“颜色革命”发生后,国内对“颜色革命”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新闻媒体最初刊发的文章甚至对通过“颜色革命”上台的政治家做了较多正面的描述和评价。直到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12月哈萨克斯坦等边境国家相继因选举发生运动,“颜色革命”形成一种趋势时,国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媒体也才迅速转而开始揭露“颜色革命”的内幕。

教育部迅速意识到落实此前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计划的政治意义和政绩价值,开始以新的政治理由推动前述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计划。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的配备和培训工作,为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工作提供了抓手,大大扩充了基层队伍的力量。2006年4月27至4月28日,教育部在上海召开首次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会议,讨论了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和“2006年到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培训计划”,并紧接着出台《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第24号令),强化高校学生管理科层体系。文件明确规定了高校辅导员的要求与职责、配备和选聘标准、培训与发展安排、管理与考核制度;要求高校从选聘、培训、发展保障多个方面推动专职辅导员制度发展,师生配备达到1:200。^①针对专职辅导员的培训工作也逐步推开。截至2015年7月,教育部思政司先后举办了49期全国辅导员骨干示范培训,共培训8000余人次,全国各级各类辅导员培训共计11万余人次。^②除此之外,教育部还开始对高校专业教材、教师行为等进行规范,要求高校加大对班集体、班主任、班干部、基层党团活动的支持。十八大之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党组织工作进一步强化。高校学生工作部门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得到了更有力的保障,并且与上级对口部门产生了更频繁的纵向互动。

相对于作为群团组织的共青团,作为行政系统的学生工作部门(覆盖思想政治教育、就业、资助、心理咨询、宿舍管理、军事训练等多个方面)更倾向于激活院系学生工作办公室、班集体、宿舍等行政组织单元的活力。但共青团组织对学生社团的发展和利用经验也被学工部门及院系学生工作办公室仿效。尽管制度明确了辅导员师生配比,并且确实有不少学校增加了专职辅导员的人手,但受“去行政化”改革意识形态的制约,这些行政部门人手仍然非常紧张,这种“去行政化”的意识形态因为意味着高效、科学而被中央所接受,因为符合高校师生限制官僚制和意识形态管控,争取自主空间的愿望而被师生认同和坚持。它有着丰富的内涵,但首先被操作化为对行政人员编制规模的控制上。从2002年到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本部学生人数增加了1.5倍,本部专任教师人数增长将近1.2倍,但行政管理人员仅增加了45%。高校思政工作人员由于没有高校教师资格或不承担教学工作常被归为行政人员或党政干部。直到2006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后,高校专职辅导员才数量才从2005年的2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13万多人。高校要增设专职辅导员或向专任教师摊派学生管理任务仍面临多重困难。北京市2013年专兼职辅导员人数才5000人,学生和辅导员数量比仍高达214:1,其中专职辅导员占只有73.5%,其余为工作保研的本科毕业生。^③大量繁杂细碎的学社管理服务事务落到这些数量有限、晋升困难、变动频繁、权威低正式教师一等的青年辅导员肩上。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进行的“首都高校辅导员职业状态的调查”

① 2000年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教党[2000]21号)中对此的建议是“根据各高校的经验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影响较大、稳定工作任务较重的高校,原则上可按1:120~150的比例配备专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人员”。

② 柴葳、郑丽平 2016,《高扬信仰的风帆——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综述》,《中国教育报》12月7日(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6-12/07/content_467986.htm?div=-1)。

③ 《敬业的高校辅导员,如何更专业》2015,《光明日报》7月23日(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5-07/23/nw.D110000gmrB_20150723_1-15.htm)。

显示,首都高校辅导员平均每个工作日工作 11.6 小时,高强度、高负荷成为常态。^①因此,除聘用兼职学生助理外,这些单位也设法支持学生自治组织(如团学组织、宿舍管理委员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甚至直接培育新成立学生社团,^②作为自己的助手,以更好地与学生联系,完成相关学生管理和服务工作(见图 5)。随着自发学生社团和学校相关部门支持的附属性学生组织的发展,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在班级、院系党团组织之外实现了再组织化,避免了进一步的原子化,抵制了宗教组织等其他组织在高校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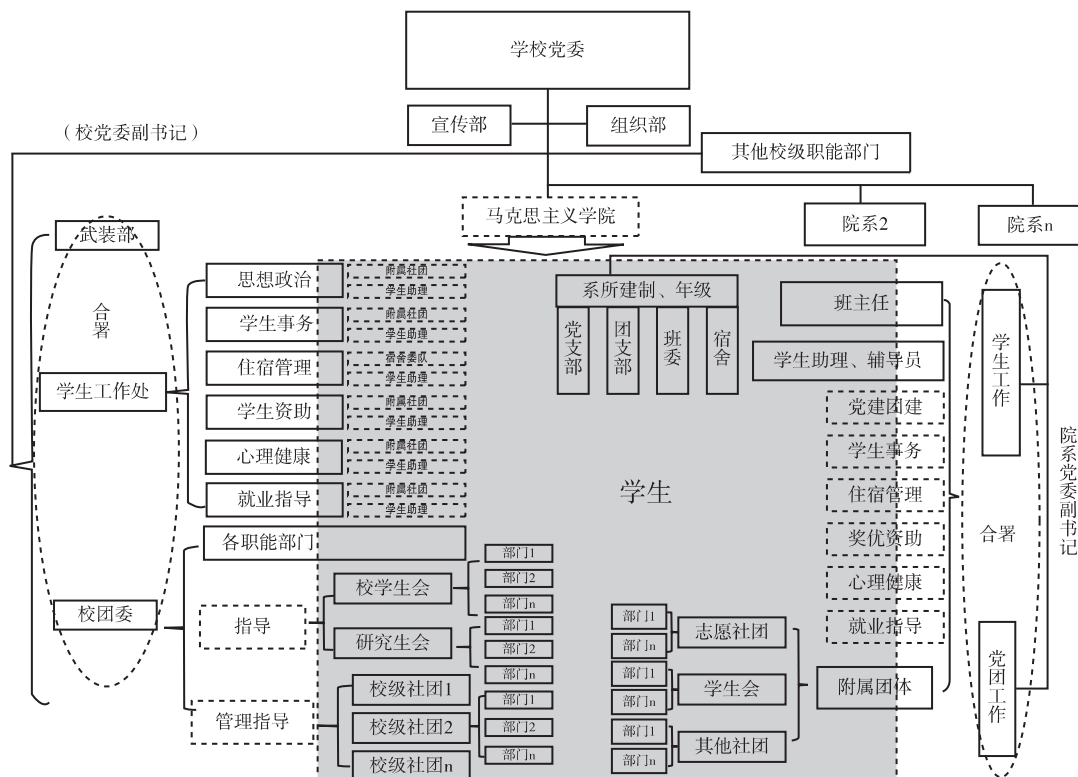


图5 学生社团发展后我国高校学生治理的组织体系

在这种更谨慎的政治大环境下,高校学生社团活动的管理更加精细化并注意其政治性了,但大学生的自由结社以及社团管理制度被保留下来。第一,社团成立和活动管理进一步制度化、程序化,相关服务更加人性和便捷(如网络化),使得合法社团的成立和活动更加容易,催生了大量学生社团组织和社团活动。第二,社团活动的管理更加精细化,相关责任都具体落实到个人和部门。学生社团的指导权和活动审批权向各级团委、学工部的专职辅导员而非普通教师收拢。有风险或违规嫌疑的活动(如存在安全风险、政治敏感或太商业化)在审批过程中会被灵活劝阻。违规举办活动和造成不良影响,相关社团将被追究责任,剥夺招新、开展活动的权利,直到被注销,^③相关负责人(包括指导老师)将会面临警告或处分,在评优等方面蒙受损失。第三,加大了对学生社团及课外

^① 陈鹏 2015,《高校辅导员怎样离学生更近一点》,《光明日报》7月13日,(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5-07/13/nw.D110000gmrb_20150713_1-06.htm?div=-1)。

^② 北科百科 2017,《北京科技大学社团列表》6月3日(<http://wiki.ibeike.com/index.php/北京科技大学社团列表>)。

^③ 2015年11月,北京大学著名社团“爱心社”因干扰讨论课被学生投诉,课外指导中心给予社团暂停一个月场地使用权和品牌社团参评资格的处分,参见久聚网上的讨论:<http://www.9org.com/Discussion/detail?id=1cXt4>。

活动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引导。通过社团评优、个人评奖等方式,鼓励学生社团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为高校人才培养和校园文化建设服务。

与此同时,跨校社团联合和交流虽然仍在增加(李朝晖等,2014),但不再被鼓励。地方团委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区及体制外青年的联系和组织上。首都大学生社团联合会成立后,当时的共青团北京市委大学部负责人转向20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工作,首都大学生社团文化季活动停办。此后,北京团市委中专大学部组织的跨校社团活动更多是类似“北京高校社团工作交流会”以及“千团大战”社团评选之类的社团管理相关的活动。

随着教育部思政司对高校学生工作和专职辅导员队伍配备的强调,高校政工人员(特别是基层党团干部)被更多地整合进专职辅导员队伍,共青团组织和其他高校学生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调整。相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巨大投入,共青团系统提供的资源有限,加上自身改革的政治紧迫性,上级团委的工作重点有所调整。高校共青团在纵向联系和跨校联系上有所减弱,并试图通过“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谋求稳定的校内支持与业务空间,努力整合进以教育部和高校党委领导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总体布局 and “大思政”工作格局,^①越来越多的高校团委可能会和北京大学团委一样,逐步向专业化、职业化的方向发展。这种专业化、专职化其实也是“颜色革命”前,上级重视还不够时,高校学生工作部门试图前进的方向(很多学校在这一时期独立发展出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学生资助中心等机构)。

六、小结与建议

当前,高校学生治理呈现出既严肃又活泼的状态。高校团委指导的社团代表大会或社团联合会,在学生社团治理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合法成立和开展活动的学生社团满足了大学生日益提高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需求,促进了大学生之间的互动、互信,培育了社会资本,锻炼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参与的能力。自发的、多样化的社团活动成为大学生自我服务和 service 社会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高校实现了对学生自组织及其领头人的有效控制,维护了高校的稳定和正常的教学秩序,违反规定的学生社团难以获得合法身份及开展活动的机会。传统的班级、党团组织虽然得到资源补充,但仍不是学生课外活动的首选。高校学生治理的模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自主成立的学生组织或团体扮演的作用越来越大。

经过上述发展,大学生得到了尽管有限但制度化的结社自由,学生社团得到了合法的发展空间,为学生利益的组织化表达增加了渠道。学生社团成为高校共青团以及学生工作部门基层工作的重要抓手,整体重要性甚至超过学生会。这些学生社团让更多学生有了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甚至服务社会的机会;而学生会则承担着更为专属的、仪式性的政治角色。不过,由于政治环境的限制,自主的政治社团(特别是反对性的)在高校仍然较难成立。之所以如此,学校控制是一方面,大部分学生对政治对抗的兴趣不大是更为重要的原因(Yan, 2014)。那些不被鼓励的讨论和活动转入隐蔽状态或进入更难监管的互联网。后者为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自由表达空间,更高效的动员网络,维持了青年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和自由感,起到安全阀作用。从北大静园-燕京学堂事件,^②中山大学草坪禁令和清理修车、修鞋摊引发的网络讨论^③等一系列高校相关的集体事件和舆情案例可以看到,互联网已成为大学生利益表达和资源动员的首选渠道,校园社团活动累积的

^① 2017年6月,团中央联合教育部印发《加强和改进高校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再次为高校共青团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参见:<http://www.gqt.org.cn/documents/zqlf/201706/P020170605397091519794.pdf>。

^② 季星,2014年,《北京大学“燕京门”实录》,《南方周末》7月18日(http://edu.southcn.com/e/2014-07/18/content_104609106.htm)。

^③ 徐笛薇,2016,《中山大学欲搬除30年修鞋摊引学生争议:请呵护历史中的人情》,6月1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76815)。

社会资本和组织能力是可以被借用的。这对高校管理决策机制和舆情应对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社会治理升级需要社会组织自主性和公共性的发展,但又要保证忠诚性。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治理实践问题。对口联系的群团组织和党政部门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估相关社会组织的政治对抗性,积极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争取政治信任和制度化空间。最终的出路在于,国家和社会组织要逐步就社会组织不可触碰的红线和边界达成共识,严厉打击越界行为,积极保护合法权益。将相关规定制度化、公开化,将相关责任和权力落实到具体组织和个人,让社会公众都能清楚相关的制度和规定。与此同时,逐步改善社会组织发展所需要制度和条件;为社会组织实现自身价值、表达利益诉求提供制度性的渠道和平台;在培育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提高它们自我服务、服务他人能力的同时,逐步扩大他们体制内的意见表达通道,加强他们与党群组织、人大代表或政协代表的联系,增进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认同。高校团委指导下的学生社团联合会及其社会管理实践为基层社会组织治理提供了一种思路。

这种治理模式将社会组织的备案、注册、管理的行政权力与社团代表大会或社团联合会的自治权力结合起来,既提高社会组织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又为保护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制度化的保证;既方便民间组织取得合法身份,开展合法活动,也有利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和治理。一些地方和部门正在积极推动成立类似的社会组织联合会,例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联合会、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国佛教协会等专业性、领域性、区域性的社会组织联合会在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合作交流、形成共识和制度规范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既为社会组织进行利益表达提供了畅通的渠道,也为党和政府了解社会组织的状况,回应社会需求提供了平台。从而化解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误解和对立,扭转社会组织和国家关于双方彼此对立的观念,向合作增权的方向发展。

具体操作上,政府可以通过场地支持、资金支持、荣誉奖励等方式系统性地调动民众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引导基层治理从直接提供服务向培育社会资本、支持社会组织成长、提升民众自我服务能力的方向转移。在当前情境下,中央政府严格控制了各级政府的编制规模。和高校管理者难以满足大学生的需求一样,基层政府要想通过直接提供服务来满足人们日益提高且越来越专业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那些人口大规模流入的城市地区,经常面临需要用乡镇级别的人员编制管理服务县区规模人口的情况。因此,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成为必需,政府不得不依靠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参与相关服务的供给。虽然人员编制受到了严格控制,但政府掌握的财政及资源却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制度化的公共服务采购,给社会组织的发展注入体制资源。大力推动民间基金和社会慈善事业规范化发展,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资源支持。将社会组织推向竞争化的“社会服务市场”,让他们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争取资源和民众支持。同时将民众的社会参与同“积分入户”制度、市民荣誉制度等联系起来,激励市民和移民的公共参与,推动城市文化发展。落实好公共空间的使用和管理制度。让社会组织及其参与者知道规矩,了解底线,明确红线,加强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一旦违规违法,首先会遭遇来自市场、服务对象和社团联合会的淘汰或惩罚,而这些惩罚背后有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作为坚强后盾。这样,社会参与积极性较高的群众被引导进日常治理中各种政治属性相对较弱、忠诚度较高的社会组织,在改善公共服务的同时,通过深入群众组织中的党群组织及民意代表表达自身多方面的利益诉求,提高政治效能感;而正式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则被控制在正式化政治实践中,即便存在少数反对派,也能确保社会主义民主的可控性。

除借鉴高校学生社团治理的经验外,还可以将高校作为城乡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构建城乡社会治理创新体系。首先,高校是城乡居民和社会公民孵化器。学生在校期间的社团参与和组织实践可以累积社会资本、锻炼组织能力,为毕业后推动社会组织发展,成为城乡社会治理主体提供基础。其次,高校是城乡管理者的训练营。大量学生社团骨干、学生干部通过“三支一扶”“选调生”“大学生村官”“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等就业渠道成为城乡基层管理者、服务员,将大学校

园中的治理经验带到了基层社区,使基层社区治理与高校学生治理协同发展。甚至可以鼓励高校学生工作者、专职辅导员和城乡社区工作者进行交流学习,提高技能的通用性和专业性,打通职业流动的渠道。最后,进一步总结共青团组织在学生社团管理和高校学生治理方面的经验,借助群团组织改革契机,提升各大群团组织联系群众、培育社会组织的能力,提高社会建设在党的工作中的重要性以及社会工作委员会的统领性,为党凝聚社会力量,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储备可以依靠的力量。

参考文献:

- 白鑫刚 2008,《素质教育视角下的高校学生社团建设》,《继续教育研究》第3期。
- 陈莉 2013,《高校学生社团联合会合法性机制探讨》,《高教发展与评估》第4期。
- 冯钢 2012,《论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兼论‘社会复合主体’》,《浙江社会科学》第1期。
- 冯志明 2011,《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浅探》,《思想教育研究》第10期。
- 顾海良 2004,《深化科学性 加强针对性 提高实效性——当前高校“两课”教育教学改革的根本问题》,《中国高等教育》第11期。
- 顾昕、王旭 2007,《从零和博弈到相互增权:中国社团发展政策的新思维》,《中国公共政策评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顾昕、王旭、严洁 2006,《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协同发展——民间组织的自主性、民主性和代表性对其公共服务效能的影响》,《开放时代》第5期。
- 关信平 2011,《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建设路径》,《人民论坛》第11期。
- 何邦键 1994,《高校共青团工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几点思索》,《丽水师专学报》第1期。
- 何增科 2006,《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分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第6期。
- 胡继冬 2012,《我国高校学生社团发展动力及其引导策略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胡继冬、高中建 2011,《对高校学生社团的组织属性及其发展的再认识——以自组织理论为视角》,《思想教育研究》第9期。
- 黄晓春 2017,《中国社会组织成长条件的再思考——一个总体性理论视角》,《社会学研究》第1期。
- 黄晓春、嵇欣 2014,《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第6期。
- 纪莺莺 2013,《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理论视角与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 2016a,《国家中心视角下社会组织的政策参与:以行业协会为例》,《人文杂志》第4期。
- 2016b,《治理取向与制度环境:近期社会组织研究的国家中心转向》,《浙江学刊》第3期。
- 2017,《从‘双向嵌入’到‘双向赋权’:以N市社区社会组织为例——兼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浙江学刊》第1期。
- 敬义嘉 2016,《控制与赋权:中国政府的团组织发展策略》,《学海》第1期。
- 康晓光、韩恒 2005,《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
- 2008,《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开放时代》第2期。
- 李朝晖、穆娜、赵彦莉 2014,《维稳视角下高校学生社团活动管理状况的实证研究——基于全国17个省、市54所高校抽样调查数据》,《黑龙江高教研究》第5期。
- 李浩泉 2014,《躁动的青春——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学生社团活动(1912-1949)》,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李路路 2013,《中国大学生成长报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李威利、郑长忠 2015,《重建整体性的组织逻辑——新形势下共青团团属社会组织发展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3期。
- 李友梅、肖瑛、黄晓春 2012,《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李志清 2012,《高校学生社团在校园创新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中国高等教育评估》第4期。
- 林泰、彭庆红 2003,《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制度的特色及其发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刘海春 2013,《共青团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现实思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3期。
- 刘秀丽、陶伟华 2013,《维稳视野下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探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第6期。
- 刘宇昊 2012,《治理视角下的高校学生社团建设》,《江苏高教》第2期。
- 罗贵榕 2006,《论群团组织的角色转型——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在建构公民社会中的领航作用》,《法制与社会》第18期。

- 麻富游 2008,《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的高校学生社团建设》,《教育与职业》第 11 期。
- 潘秀山、赵彦莉、张春艳 2012,《维稳视角下高校学生社团活动管理机制探究》,《中国轻工教育》第 6 期。
- 彭定国 1991,《增建和突出高校“学生类”档案刍议》,《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 6 期。
- 石国亮 2009,《高校学生社团发展的新趋势》,《青年探索》第 3 期。
- 孙蚌珠 2002,《普通高校“两课”青年教师队伍状况分析》,《高校理论战线》第 12 期。
- 田凯 2016,《发展与控制之间:中国政府部门管理社会组织的策略变革》,《河北学刊》第 2 期。
- 王珩 2007,《高校学生社团发展调查报告——以浙江省高校为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 3 期。
- 王蕾、笕远平、路平 2012,《维稳视角下的高校网络社团建设》,《中国轻工教育》第 1 期。
- 王名 2009,《走向公民社会——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及趋势》,《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 3 期。
- 王鹏 2013,《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枢纽型组织构建——以共青团为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 5 期。
- 王运东、刘桂宇 2013,《社会管理理念视域下的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模式创新》,《思想教育研究》第 9 期。
- 夏敏 2012,《大学班级组织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教育研究》第 10 期。
- 向顺涛 1992,《大学生社团文化的偏差浅析》,《青年研究》第 6 期。
- 徐双敏、张景平 2014,《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逻辑与路径——以共青团组织为例》,《中国行政管理》第 9 期。
- 俞可平 2006,《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
- 张长东 2014,《混合型政体与威权主义韧性研究》,《国外理论动态》第 5 期。
- 张宏 2004,《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与发展合格大学生党员初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第 1 期。
- 张丽媛 201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社团的路径研究》,《黑龙江高教研究》第 9 期。
- 张仁伟、葛卫华 2008,《学生社团建设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思想理论教育》第 3 期。
- 张羽、杨斌、张春生、朱恒源 2011,《中国高校班集体制度对学生成绩影响的实证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郑长忠 2010,《走向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逻辑——基于对中国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关系的考察》,《中国青年研究》第 8 期。
- 2012a,《复合型团青关系:新时期团青关系的实现形态——兼论共青团枢纽型组织形态建构的内在机理》,《中国青年研究》第 10 期。
- 2012b,《关系空间变迁的政治逻辑——中国共青团 90 年组织形态发展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 5 期。
- 2013,《建构共青团组织创新的体制内政治支持——新时期高校党建带团建研究》,《复旦教育论坛》第 3 期。
- 朱小根 2005,《论高校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 1 期。
- Dickson, B. J. 2013, “Who Wants to be a Communist? Career Incentives and Mobilized Loyalty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17.
- Guo, Gang 2005, “Party Recruit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43).
- Huang, H. 2015, “Propaganda as Signaling.” *Comparative Politics*(July).
- Yan, Xiaojun 2014, “Engineering Stability: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Control ove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Post-Deng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18.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责任编辑:赵联飞

Column on the Study of Middle and Long Term Planning for Youth Development

The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 Associations'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Promoted by the Organization of Communist Youth League *Li Ding*(1)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pattern is a process of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How the country recognize and adjust its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organizations , whether empower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through cooperation or contradict and conflict with them , all these would have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pattern. This article tries to restore the historic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fixation of governance pattern of college student associations , which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ed by the organization of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n this basis , we further show the role of mass organizations in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in social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legitimacy of country management simultaneously , we must liberate the thought , seek truth from the facts , set up reasonable system framework , and ensure the development space and autonom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 associations'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 which could provide some valuable reference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mmon governance of folk social organization.

Key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munist Youth League Student Associations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al Governance

The Adolescents'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 *Liu Shan & Shi Renbing* (17)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2000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Hunan , Guangdong , Guangxi , Shanghai , Gansu , Zhejiang , Fujian and Jiangsu ,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level of adolescents' moral disengagement , the condition of prosocial behavior and its structure , the influenc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on the adolescents' prosocial behavior. According to the study , for the contemporary adolescents , the level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s relatively low , the level of prosocial behavior is relatively high. According to the further analysis , we could find that the moral disengagement could reversely predict the adolescents' prosocial behavior significantly , namely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s , the lower the adolescents' level of prosocial behavior is. For the adolescents ,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could influence their different types of prosocial behavior.

Keywords: Moral Disengagement Prosocial Behavior Adolescents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dolescents' Migration Status and the Difference of Social Bond

..... *Hong Pei & Gao Yunjiao*(27)

Abstract: The migrant adolescents' crime is the main body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It is also a prominent social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duct the study of